

任務式指揮於防衛作戰之運用 ——就守備旅為例

作者簡介



許肇廷少校，專業軍官班102年班、步訓部正規班110年班；曾任排長、連長、訓練官，現為國防大學少校學員。



林蔚融中校，陸軍官校93年班、陸軍學院107年班；曾任排長、連長、營長，現任國防大學中校教官。

提要 >>>

- 一、隨著戰爭形態快速演變，戰場環境展現「高度變動、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混沌性」(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VUCA)特徵，對傳統指揮模式形成嚴峻挑戰。防衛作戰須結合快速反應與持續作戰能力，已成為軍事關注焦點。
- 二、任務式指揮(Mission Command)以分權決策為核心，強調指揮作戰意圖(Commander's Intent)明確傳達與上下層信任，賦予基層部隊自主應變權限，以因應戰場變化，提升整體作戰效率與決策速度。
- 三、任務式指揮在守備旅防衛作戰中強調分層決策與基層應變能力，提升面對高威脅環境下的指管彈性。透過賦權前線部隊，可加速部署與反制行動，並結合數位情報與AI系統，強化態勢感知與作戰效能。

關鍵詞：任務式指揮、守備旅、防衛作戰、分權化決策、戰場適應性



前言

當代戰爭環境的快速變遷，促使軍事指揮體系與作戰模式持續演進，以因應日益複雜且動態變化的戰場態勢。在高度威脅與不確定性並存的條件下，傳統「集中指揮、分層執行」(Centralized Command, Hierarchical Execution)模式常因反應遲緩與僵化，限制了部隊的戰場適應性與靈活應變能力。特別是在防衛作戰中，國軍守備旅作為防禦主力，須面對敵軍快速突襲，亟需具備即時反應與戰術調整的能力。任務式指揮因此成為關鍵的現代指揮理念，透過分權化決策，其做法為上級指揮官僅下達任務命令，不限定完成任務的具體方式和過程，只規定「做什麼」和「為什麼做」，而不具體規定「怎麼做」，賦予一線指揮官更大的自主權與靈活指揮方式。¹

美軍自1980年代起即推動任務式指揮，作為提升部隊戰場適應性的關鍵策略。其核心在於指揮鏈上下層須建立共同理解與行動一致性，指揮鏈上下具有共同理解與共同認知，理解指揮官意圖只提供大方向，基層指揮幹部應及時下達正確決策

，不能坐等層層同意的程序，因為這種方式將無法在未來存活。²

2003年美軍進攻伊拉克期間，面對快速推進與資訊壅塞的戰場環境，第三機械化步兵師與陸戰隊部隊普遍採取任務式指揮架構。指揮官明確下達作戰目的與行動意圖，但讓下屬單位依現場情勢調整機動路線、火力分配及時間節奏。展現任務式指揮的應變力與行動速度，亦顯示在兵種協同作戰中，各部隊能因地制宜協調完成目標，成功壓制伊軍主力。

然而，國軍現行守備旅指揮架構仍偏向高度集中，指揮層級繁複、授權程度不足，使基層部隊難以靈活回應敵情變化，與任務式指揮「去中心化執行」(Decentralized Execution)的原則相矛盾。尤其在當前中共日益強調混合戰(Hybrid Warfare)、多波次打擊與資訊戰並行的新型態作戰模式下，³傳統僵化的指揮流程恐難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威脅場景。

因此，探討任務式指揮在守備旅執行防衛作戰中的可行性與實施模式，並評估對部隊調度、資源配置與戰術應變的影響。期望透過系統性分析與現實驗證，提出具體建議，以建構更具彈性與效率的國

1 U.S.Army, <Ar my Doctrine Publication 6-0: Mission Command-Command and Control of Army Forces>, U.S.Army, 2019, p.2.

2 劉宗翰，〈消弭微觀管理與採行任務式指揮〉《陸軍後勤季刊》，2023年2月，頁60～62。

3 莊捷、方自億，〈混合戰作戰樣式與運用之研究：以臺海戰爭想定為例〉《國防雜誌》，第36卷2期，2021年6月，頁53～57。

軍現代化指揮體系，有效因應未來戰場挑戰。

任務式指揮之內涵

「任務式指揮」為現代軍事核心指揮觀念，其核心在於明確傳達指揮官意圖並適度下放決策權限，使部隊能依戰場實況自主調整行動，以提升在高變動戰場中的靈活性與作戰效率。

一、起源

在18、19世紀初，軍隊普遍採用線性戰術(Linear Tactics)與層級指揮(Hierarchical Command)模式，採高層制定詳細戰術計畫，基層部隊嚴格執行命令，以確保戰場秩序。然而，隨著火炮技術進步、戰場規模擴大，傳統的集中指揮模式逐漸顯現適應力不足，難以應對高機動戰與高強度衝突環境。⁴

19世紀後期，普魯士軍隊在拿破崙戰爭後進行軍事改革，其中赫爾穆特·馮·毛奇是關鍵推動者。1857年，毛奇出任普魯士參謀總長，在普丹戰爭(1864年)、普奧戰爭(1866年)及普法戰爭(1870、1871年)中，透過戰略創新確保普魯士取得決

定性勝利，奠定德意志統一的基礎。他認知到鐵路、電報、武器裝備及軍隊動員體系的進步，使戰爭變得更加快速與不可預測，因此推動「任務型命令」，強調基層指揮官須理解上級作戰意圖，並根據戰場實況自主決策。並於普法戰爭成功驗證了此模式，確立其作為普魯士軍事學說的核心。⁵

20世紀初，「任務型命令」進一步發展，並與機動戰、戰壕戰相結合。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靜態戰爭環境下，其優勢未能完全發揮。1930年代，德國國防軍進一步將裝甲戰與閃電戰(Blitzkrieg)納入指揮體系，強化裝甲部隊自主性及協同作戰效率，使「任務型命令」發揮更大效能，並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期間德軍指揮的基礎。⁶

戰後，美軍深入研究德軍的「任務型命令」，發現該模式能顯著提升部隊自主作戰能力。及至2019年，美國陸軍就其2012年界定的定義重新定義任務式指揮是一種指揮與管制模式，強調分散執行的權力，賦予下級在適合情況下進行決策，以應對複雜的戰場環境。⁷

4 林挺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洛林—孚日會戰：作戰層次的指揮管制模式分析〉《國防雜誌》，第34卷2期，2019年6月，頁70、71。

5 莊朝欽、姚祐霆，〈從「任務式指揮」之運用效益反思國軍砲兵部隊指揮與管制模式—以基地訓練為例〉《陸軍學術雙月刊》，第60卷598期，2024年12月，頁73。

6 唐納德·凡德格里夫，《任務式指揮》，美國海軍學會出版社，2019年。頁35～76。

7 同註5，頁73。



二、定義與原則

美國陸軍在2012年將任務式指揮概念進一步擴展，將其不僅視為一種戰鬥職能，更納入指揮系統及軍事理念，並取代傳統的「指揮與控制」概念。此一變革在美國陸軍內部引發了概念混淆，使許多指揮官難以精確理解和實踐該模式。⁸ 因此，美陸軍於2019年《美陸軍準則6-0號》對任務式指揮的概念及特性進行了明確界定。該準則強調「分散式執行」(Decentralized Execution)的重要性，並確立現代戰場上的應用範疇，提升部隊應對不確定性與作戰環境複雜性的能力，任務式指揮涵義與特性(如圖1、2)，主要包括以下：

(一)定義

美陸軍將任務式指揮定義為：「指揮官以任務式命令行使其指揮權責，依其意圖規範行動，使聯合地面作戰更敏捷，更能因地制宜」。⁹ 依據此定義歸納出三個密切要素，彼此互相影響並構成完整的戰場指揮架構。以下是關聯性分析：

1.權力與指揮

任務式指揮以指揮官為權威核心，透過明確的指揮意圖引導部隊行動，而非受制於細緻且僵化的指令約束。此一作戰賦予基層指揮官更大裁量權，確保決策能適應戰場瞬息萬變的態勢變化，並提升作戰彈性與適應性。¹⁰ 對指揮官而言「意圖表述」與「判斷容錯能力」要求極高。

2.去中心化執行

戰術層面的裁量權下放至基層指揮官。此特徵顛覆了傳統集中指揮自上而下的權力分配模式，旨在提升部隊於動態戰場中的反應速度與靈活性，可有效彌補集中指揮因資訊滯後而失效的缺陷，¹¹ 若基層指揮官缺乏足夠的戰術素養、對意圖理解不足或相關訓練不足，反而可能導致戰術行動脫節，產生反向效果。

3.統一作戰

整合各作戰單位與資源，確保部隊於多層次、多領域戰場中有效運作，現代防衛作戰不僅涉及傳統地面部隊，更涵蓋空中、電子戰、無人機偵察與網路戰等要素，有賴堅實的資訊整合能力與聯合指管架構支撐，須確保各單位之間能夠無縫協

8 劉宗翰，〈理解任務式指揮〉《砲兵季刊》，第199期，2022年12月，頁84～91。

9 胡元傑，〈削足適履：美國陸軍任務式指揮之分析〉《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4卷559期，2018年6月，頁80。

10 Ibid 1, p.1.

11 U.S.Department of Defense,<Joint Publication 5-0: Joint Planning>,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20), IV-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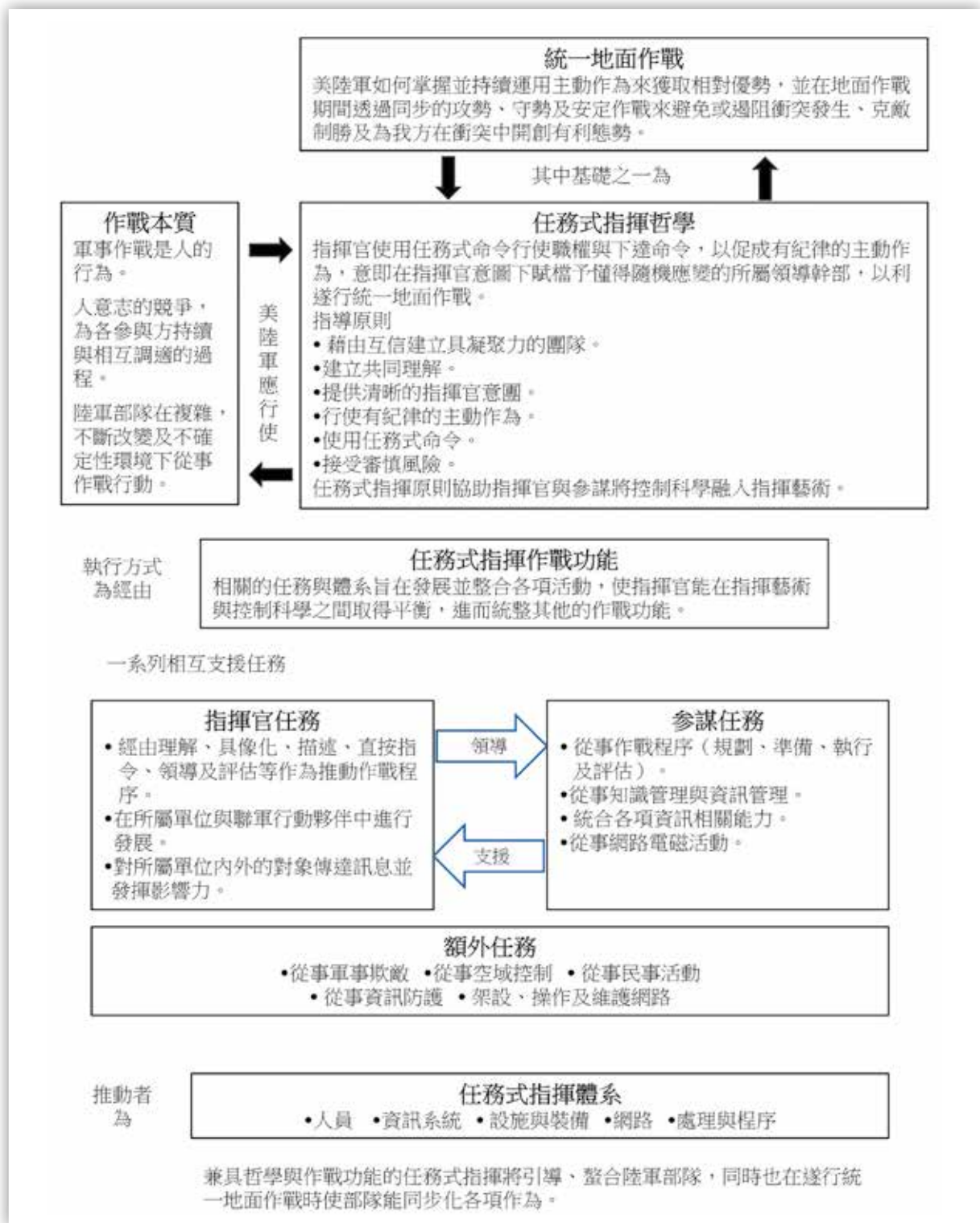


圖1 任務式指揮邏輯圖(一)

資料來源：1.ADP 6-0 Mission Command: Command and Control of Army Forces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19).

2.作者整理繪製。



戰爭的本質

軍事行動是人類活動的一環，涉及意志的競爭，這些行動在充滿暴力的情況下，所有參與者不斷地適應動態且不確定的環境，以達成政治目的。

軍事行動必須考慮戰爭的本質，因此，陸軍的作戰概念是：

統一陸上作戰

同步執行攻擊、防禦及穩定性作戰，並在民間的國防支持下，跨越多個領域以塑造作戰環境、預防衝突、在大規模地面戰中取得勝利，進而鞏固統一行動所獲得的戰果。

軍隊的作戰概念由以下因素所支持：

任務式指揮

陸軍的指揮與管制方法，為賦予下級在適當情況下進行決策的權力及分散執行。

依據以下原則建立：

專業能力/相互信任/共同理解/指揮官意圖/任務式命令/有紀律的主動作為/風險承擔

指揮與管制是所有作戰的基礎：

指揮與管制

指揮與管制是由被正式指派的指揮官對所屬及配屬部隊依職權行使指導及任務分配。

指揮的要素

- 職權
- 責任
- 決策
- 領導統御

管理的要素

- 命令
- 回饋
- 資訊
- 溝通

執行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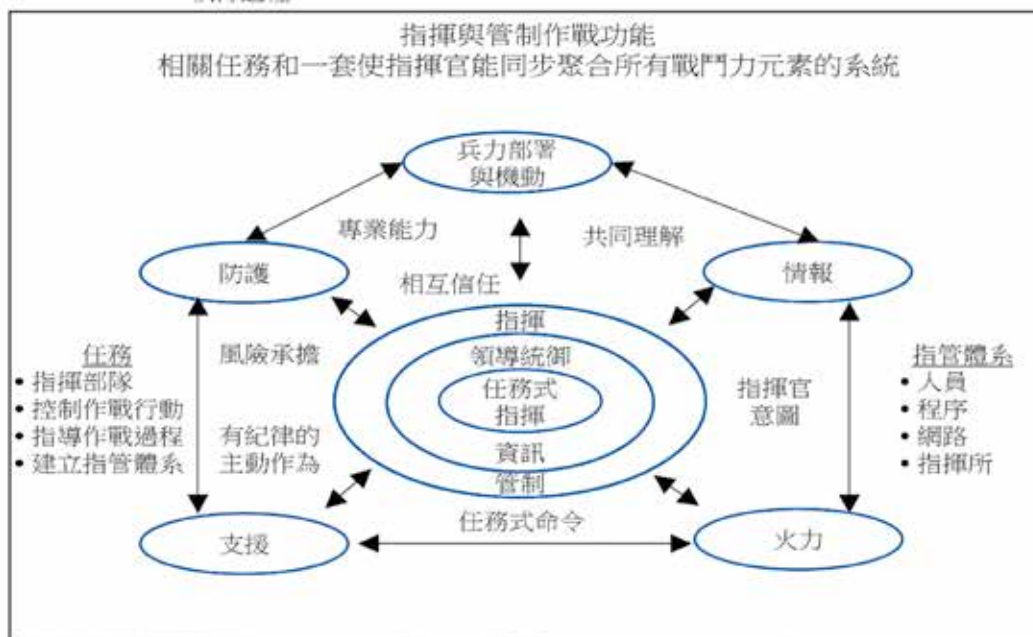


圖2 任務式指揮邏輯圖(二)

資料來源：同圖1。

同，以發揮最大戰力。¹²

(二)原則

依據ADP6-0準則說明任務式指揮有七項重點原則：專業能力、互信、共同理解、指揮官意圖、任務式命令、訓練有素的主動作為、風險承擔，只要能正確運用這些原則，就能在VUCA(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VUCA)複合環境中掌握主動權並達成分權化決策之目標，¹³ 對照國軍《陸軍作戰要綱》第204028條部隊掌握之基礎，¹⁴ 仍有些許差異(如表1)。

1.專業能力

指揮官須藉由長期歷練與知識養成，建構其具體的專業職能，並於實際作戰中展現正確判斷與靈活領導，才能使任務式指揮得以落實於快速、多變與高風險之聯合作戰環境中，¹⁵ 仍需依賴擬真訓練與模擬推演以補足實務斷層，並強化指揮教育對戰場適應性的強化。

2.建立互信

互信是任務式指揮的基石，強調上下級間的專業信賴與心理契約。上級指揮

官須信任下級並能正確解讀及執行意圖，下級則須對上級的整體戰略具信心，建立上下級間的默契。¹⁶ 若上級習慣干預基層戰術細節，不僅妨礙行動自主，亦將破壞互信根基，限制任務式指揮的發揮。

3.創造共享理解

要求所有層級對作戰環境、敵情與目標有共通認知，以確保行動的協調性與一致性。此原則依賴情報共享與溝通系統的有效運作，旨在降低戰場「迷霧」(Fog of War)的影響。¹⁷ 面對敵軍多維威脅，若資通系統未能即時傳遞資訊，可確保基層指揮官仍能按照整體戰略意圖執行作戰。

4.提供明確的指揮官意圖

意圖是任務式指揮的核心，上級須清晰表述作戰目的與期望結果，而非詳盡規範執行方式，¹⁸ 確保部隊遭遇戰場變數時，仍能根據作戰目標調整行動，若意圖表述過於模糊，恐造成誤解；若規範過細，則限制下級應變能力。

5.發揮紀律性主動性

此原則鼓勵下級在符合意圖的前提

12 U.S.Marine Corps, <MCDP 6: Command and Control>, U.S.Marine Corps, 1996,p.3-18~3-21.

13 同註2，頁56。

14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桃園，民國112年1月)，頁2-4-87、2-4-88。

15 同註1，p.2-3。

16 同註15。

17 Alberts, D.S.,<Information Age Transformation: Getting to a 21st Century Military>, CCRP Publications, 2002, p.2-4.

18 U.S.Army,<Army Doctrine Publication 5-0: The Operations Process>, U.S.Army, 2019, p.1-18、1-19.



表1 部隊掌握之基礎與任務式指揮差異表

部隊掌握之基礎	任務式指揮原則	相似處	差異處
統一戰術思想	共同理解 專業能力	強調指揮層級對任務概念一致理解，與任務式指揮中「共同理解」相符。	國軍多為上對下灌輸，缺乏基層主動參與與任務辯證過程。
示以明確作戰構想	指揮官意圖 任務式命令	都強調上級指揮官應清晰傳達任務方向與目標。	國軍作戰構想偏向具體指導，任務式指揮僅提供「做什麼、為何做」不限定「怎麼做」。
賦予明確任務與作戰企圖	任務式命令 共同理解	雙方皆重視明確任務定義與傳達。	國軍任務定義後仍須逐級確認，任務式指揮則鼓勵基層自主執行。
周密靈活通資連絡	共同理解 建立互信	確保上下傳達暢通，有助建立相互理解。	國軍仍偏重階層命令管制，任務式指揮重視即時資訊共享與分權執行。
下級指揮官適切之獨斷專行	主動作為 風險承擔 專業能力	均肯認基層於必要時獨立判斷。	國軍強調「適切」且仍須回報，任務式指揮強調主動與風險承擔的文化允許。
結論	國軍指揮程序重視任務明確與通信穩定，確保統一行動，惟其層級化架構與風險規避文化，限制基層即時應變與主動作為。相較之下，任務式指揮強調意圖導向與分權執行，具高度戰場適應力。為因應多域作戰挑戰，建議國軍導入任務式指揮原則，強化信任默契與戰術判斷能力，並透過實戰模擬培養風險承擔與自主行動，提升整體指揮效能。		

資料來源：1.ADP 6-0 Mission Command: Command and Control of Army Forces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19).

2.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桃園，民國112年1月)。

3.作者整理繪製。

下，運用充分的戰術訓練與情境應變能力之培養，主動採取行動應對突發情況，但須保持紀律，根據戰場需求主動做出戰術決策。這種機制能夠縮短決策週期，提高部隊行動靈活性。¹⁹

6.使用任務式命令

任務式命令聚焦於目的與結果，賦予下級執行方式的裁量權，區別於集中指揮的繁瑣指令及對戰術細節進行干預，²⁰

減輕上級的指揮負擔，並加速決策流程，但須確保下級對意圖的理解深度，否則可能導致行動偏差。

7.接受合理風險

指揮官在不確定性中承擔風險，以抓住作戰時機或應對危機，換取更大的戰場優勢。²¹對戰場動態性的適應，適當允許基層冒險突襲，雖增風險，但可提升整體作戰效能，但指揮官若缺乏情報分

19 同註12，p.3-18~3-21, p.3-7。

20 同註1，2019, p.5。

21 同註20。

析、風險分級與判斷標準，恐形成兩極決策。

三、任務式指揮作戰運用

任務式指揮作為一種意圖導向、分權決策的指揮，其效能不僅取決於其原則的落實，更仰賴指揮、管制與作戰功能的整合運用。美國陸軍將指揮與管制視為任務式指揮的雙核心，並通過作戰功能(如情報、火力、機動等)實現其戰場效果。特別在複雜作戰環境中，理解此三者間的交互關係，能提供理論依據與實務方向。以下從指揮與管制的定義、其在任務式指揮中的角色，以及對應的作戰功能進行剖析。

(一)指揮

指揮官行使權力與決策權，以有效管制部隊、分配資源並執行軍事行動，以達成作戰目標的過程。此過程涵蓋決策制定、作戰意圖傳達、部隊激勵及領導力發揮，旨在確保部隊在高度不確定與複雜的戰場環境中保持靈活與作戰效能。²²

(二)管制

指揮官及其參謀組織運用程序、組織架構、資訊與技術，對部隊行動進行

監督、協調與調整，以確保作戰計畫得以有效執行並達成指揮官意圖。管制的目標是維持部隊行動的一致性、確保戰場適應力，並在不確定與動態變化的環境中，提供決策支援與資源調配，以達成作戰目標的過程。²³

(三)作戰能力

美國陸軍將作戰功能定義為「指揮官用以執行作戰任務的關鍵能力」(如圖3)。²⁴ 這些功能在任務式指揮中不僅是技術性工具，更是將指揮意圖轉化為具體戰果的支撐體系；另為實踐任務式指揮應考量任務變數及分析風險程度(如表2、3)等，可供指揮官在特定狀況下，賦予下屬行使主動性的程度判斷。²⁵

守備部隊編組分析

守備部隊在軍事體系中扮演著戰略防禦、區域防護與敵軍遲滯的核心角色。其主要任務包括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維持戰略據點、確保防線穩定，並在適當時機發動反擊，以削弱敵軍戰力。隨著戰爭形態的演變，現代守備部隊的編組亦隨之調整，以適應多領域作戰與現代戰場的不對

22 同註8，頁84～86。

23 劉宗翰，〈任務式指揮2.0版：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模式〉《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4卷559期，2018年6月，頁98～101。

24 黃財官，〈從美軍聯戰準則發展與運用理解國軍聯合作戰〉《國防雜誌》，第22卷4期，2007年8月，頁74、75。

25 同註8，頁9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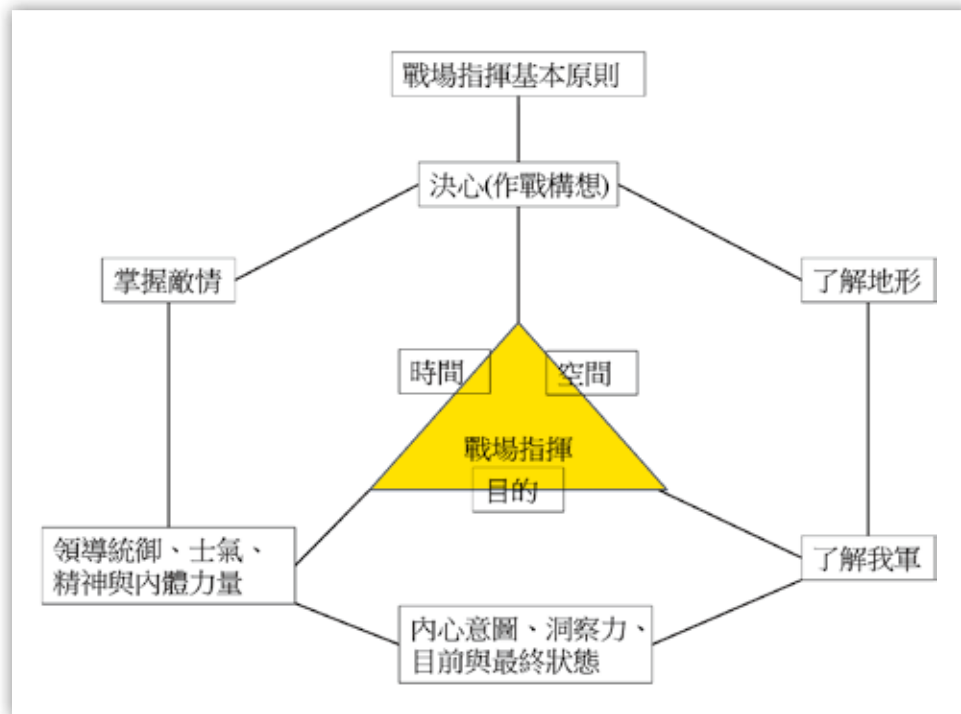


圖3 戰場指揮基本原理

資料來源：同註24，頁75。

表2 任務變數

變數	說明
任務	指揮官和參謀會根據變數對任務完成的影響來考慮所有任務變數。任務是具目的性之工作，清楚指出應採取的行動及其原因。亦是指揮官在下達決策時首先考慮的變數。任務的組成包含何人、何事、何時、何地及為何。
敵情	要考慮的第二個變數是敵方的部署情況(包括組織、戰力、位置和戰術機動性)、準則、裝備、能力、弱點及可能的行動。
地形與天候	地形和天氣分析是密不可分的，並直接互相影響軍事行動。地形包括自然特徵(如河流與山脈)和人造特徵(如城市、機場與橋樑)。指揮官使用五個軍事面向來分析地形，包括：觀察與射界、接近路線、地形要點、障礙物、隱蔽與掩蔽。而分析天氣的軍事面向包括：能見度、風、降水、雲層覆蓋、溫度和濕度。
部隊與可用資源	變數包括可用友軍部隊及支援的數量、類型、能力與條件。這些是來自聯盟國、地主國和聯合行動夥伴所提供的補給、服務和支援。另外還包括由國防後勤局和陸軍軍品司令部委請民間與承包商提供的支援。
可用時間	指揮官評估用於規劃、準備及執行任務與作戰的可用時間。包括集結、部署和機動部隊所需的時間，這當中存在與敵人及環境條件的關聯。
民事考量	民事考量是人造基礎設施、民間機構、作戰區域內民間代表、居民與組織等活動對軍事行動的影響。民事考量包括六個特徵(ASCOPE)：區域、結構、能力、組織、人員和事件。

資料來源：同圖1，pp.3~6.

表3 管制力度的掌握

←—— 較多控管 較少控管 ——→		
	思維	
●可預測 ●已知	狀況發展走向	●不可預測 ●未知
●經驗尚淺 ●新的團隊	單位凝聚力	●經驗豐富 ●成熟的團隊
●尚未接受訓練 ●需要複習	單位訓練程度	●熟練任務要項 ●準備好了
●剛開始起步 ●需要培植孕育	單位信任程度	●深厚信任 ●產生默契
●由上而下 ●明確律定 ●垂直溝通為主	溝通作戰認知 並形成理解共識	●上下互通 ●點到及達意 ●垂直及橫向交流
●限制	交戰規則	●許可導向
●決策需時較長 ●資訊需求較多 ●理想性決策	下達決策 所需條件	●較具時效性 ●尋求關鍵資訊 ●實務性決策
●戰爭科學 ●用兵之術 ●排列使其同步	任務屬性	●戰爭藝術 ●用兵之法 ●策編使其連貫

資料來源：同圖1, pp.1~6.

稱威脅。

一、部隊能力與戰術戰法

(一)部隊能力

守備旅作為我軍防衛作戰之基幹部隊，其能力設計旨在確保灘岸及離島之固守與阻敵效能，其特性可從編組結構、情報監偵及火力機動等面向加以剖析。

1.編組結構

守備旅編組以步兵為核心(如圖4)，在防衛作戰時透過上級賦予的協同作戰能力，實施多層次防禦任務，並根據敵情

地形調整部署，發揮基層指揮官的自主決策，提升即時應變效能，展現「任務式指揮」精神。此種作戰思維與美軍步兵旅於城鎮防禦中之指導原則相符。²⁶

2.火力投射與機動支援

火力則能依曲直射效能、打擊目標對象及有效射程，形成由遠程至近程階段打擊區分，由遠至近多為上級支援火力區域(空軍、航空、砲兵群等火力)、建制內砲兵彈幕帶、直射武器之上、中、下層火網，形成遠、近距離、防護及陣地內射擊等；重層火網結合工事阻絕設置，

26 陳祿保，〈美軍城鎮戰戰術、戰法之研究—以步兵旅、營階層為例〉《國防雜誌》，第21卷6期，2006年12月，頁119~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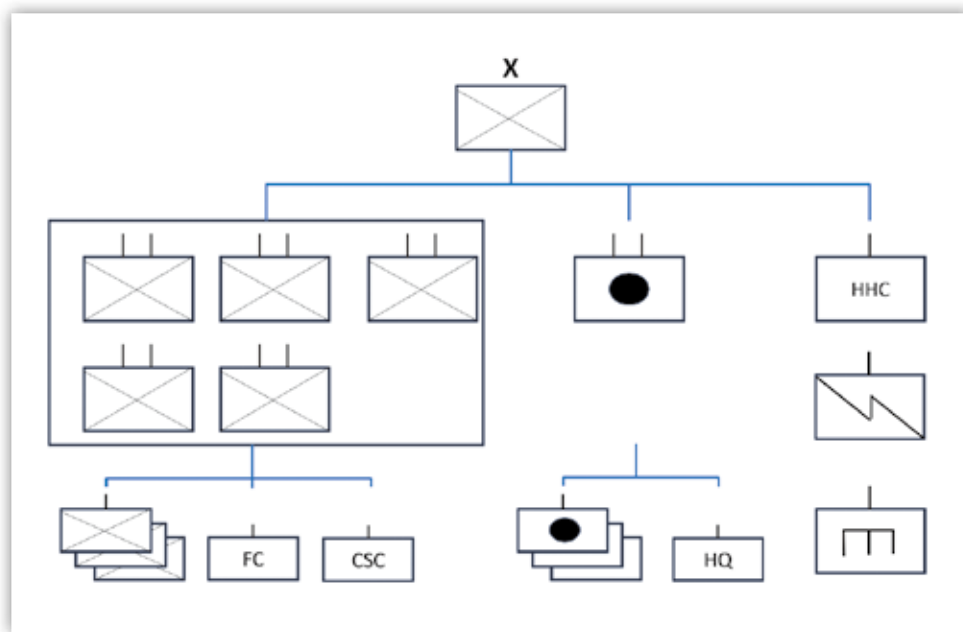


圖4 守備部隊兵力編組示意圖

資料來源：同註32，頁13。

運用戰術型、輔助型及防護型阻絕等功能，並建立「預想殲敵地區」，期使敵軍受到連續不間斷之封阻及火力打擊，逐步迫使敵軍進入區域內，予以殲滅(如圖5)。²⁷

(二)戰術戰法

國防部於112年向立院提出「發展不對稱作戰之精實成效案」書面報告內容提及「拒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水際灘頭、殲敵於城鎮陣地」戰略指導，²⁸守備旅於防衛作戰中之戰術運用

，善用地形、戰術欺敵、精準火力與不對稱作戰，聚焦殲敵於灘岸和城鎮陣地內，並有效削弱敵軍戰力，為主戰部隊創造戰場優勢。其具體戰術如下：

1.不對稱作戰與削弱戰術

依據我軍「防衛固守、重層嚇阻」戰略指導，運用不對稱作戰思維，發揮聯合戰力，使敵陷入多重困境，對敵實施重層攔截及聯合火力打擊，逐次削弱敵作戰能力，瓦解其攻勢，以阻敵登島進犯。²⁹基層部隊有效運用「靈活應變」與「意圖

27 同註26。

28 中華民國立法院，《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31號》，民國112年4月12日，報2178。

29 胡敏遠，〈貫徹國軍軍事戰略——「防衛固守、重層嚇阻」作為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5卷565期，2019年6月，頁18～25。



圖5 兵、火力部署示意圖

資料來源：同註32，頁22。

導向」原則，符合任務式指揮強調之分散決策與情境適應。

2.彈性作戰

逐次抵抗是具高度彈性的戰術方式，透過分段部署、轉進與火力掩護方式，削弱其戰力，其目的是拖延敵軍推進速度，並爭取時間以利主力整備或發動逆襲，³⁰使基層靈活調整陣地位置，減少正面接敵並有效掌握戰場節奏，與任務式指揮中「分權決策」與「情境適應」原則高

度一致，適用於應對高強度、快速變化的城鎮戰場環境。

3.精準火力運用

火力運用強調分層整合與目標選擇，牽引榴砲擔任中程支柱，迫砲與反甲武器構成近程防衛，視狀況協調遠程飛彈打擊敵登陸與後續梯隊。基層單位須依敵情掌握射擊時機，落實任務式指揮下火力自主運用，³¹若射擊時機判斷失誤、敵偽裝成功或資訊不同，反而將造成火力

30 同註26，頁124、125。

31 林保丞，〈防衛作戰時地面火力快速作業之芻議〉《砲兵季刊》，第205期，2024年6月，頁22～28。



浪費與行動延誤。

二、現行裝備能力與限制

守備旅裝備設計旨在支援固守與阻敵任務，涵蓋火力、情報監偵與機動支援等功能，在防衛作戰中具備一定壓制與應變能力。惟受射程、數量、技術水準及地形等因素限制，裝備效能於現代戰場中呈現侷限，可能削弱任務式指揮下基層部隊的靈活運用。本節將從火力、情報監偵與機動三方面，剖析守備旅之裝備能力與其限制。

(一)火力支援

守備部隊現編有直射武器、曲射火炮、反裝甲火箭及上級支援火力，能對登陸艦、水陸坦克及兵員構成初步威脅(如表4)，³² 然而，受限於射程與精準度，

火力效能高度仰賴精確情報與戰術調整。若無法有效整合外部火力支援(如海軍雄風飛彈)，恐難貫徹作戰意圖，並限制基層單位於任務式指揮下的火力決策彈性。³³

(二)情報監偵

守備旅之情報監偵能力，主要依賴偵察排、砲兵觀測組及岸巡與上級單位提供之偵蒐支援，整體仍以地面監偵為主。雖無人機已逐步建置，惟受限於數量、航程與干擾抵抗能力，尚難滿足中高強度作戰所需。倘若敵軍實施電子干擾，將可能嚴重削弱守備旅戰場感知能力，影響即時應變與任務精準執行。³⁴

(三)機動支援

守備旅主要機動裝備為3.5噸中型

表4 武器射程、打擊對象參照表

區分	武器型式	有效射程	打擊對象
遠程曲射武器	105榴砲	11,000 公尺	兩棲車輛及散兵群
	120迫砲	6,100 公尺	
	81迫砲	3,547 公尺	
	60迫砲	2,117 公尺	
上層火網	50 機槍	2,000 公尺	低空航空器、輕裝甲車輛及散兵群
	40 榴彈機槍	1,500 公尺	兩棲車輛
中、下層火網	各式步、機槍	1,000公尺以內	散兵群
反裝甲火制區	66 火箭彈	200 公尺	兩棲車輛

資料來源：同註32，頁15。

32 呂秉洋，〈守備部隊反制共軍立體超越上陸作戰之研究〉《步兵季刊》，第287期，2023年3月，頁14。

33 同註31，頁22～30。

34 同註29，頁24、25。

與1/2噸輕型戰術輪車，負責陣地轉移、機動增援與補給運輸，支援防線調整與快速反應。此機動能力有助於任務式指揮下部隊靈活部署，但在地形適應性與持續作戰支援方面仍有限。若補給無法即時跟進，將制約基層部隊應對多點威脅的彈性與意圖貫徹能力。³⁵

三、分析與運用

在當前多威脅交織、戰場動態高度複雜的作戰環境中，國軍守備部隊執行任務所面臨的挑戰，逐步突顯出傳統中央集權式指揮體系的侷限。面對敵軍機動突襲、多點登陸、電磁干擾等高強度威脅，守備部隊之指揮層級過多、授權不足的現象，易導致行動遲滯與錯失戰機，不利於達成遲滯、阻敵與固守等核心作戰任務。

基層指揮官的戰術應變與獨立判斷能力，亦受限於現行訓練機制的僵化與風險迴避導向，無法在緊急戰況下有效發揮「自主反應、快速決策」的能力。再者，守備部隊於情報監偵能量方面仍倚重地面觀測與上級提供之有限資源，自主監偵裝備如無人機數量與運行時間皆無法有效支援多點、多波次作戰需求，造成戰場感知不全，進而限制部隊之反應準確度與戰術選項。

火力支援方面，雖具備基本直射、

曲射與反裝甲火力配置，但射程與打擊能力仍無法完全涵蓋敵登陸或轉進行動所需距離，且需依賴外部火力支援，在指揮協調繁複情況下難以即時發揮效果，削弱基層在任務式指揮下所需之「自主整合與迅速壓制」能力。此外，機動支援受限於裝備地形通行性與後勤補給可及性，亦影響基層部隊於戰場變化中的重新部署與陣地轉換能力。

因此，若欲強化守備部隊之任務執行效能，必須同步推動任務式指揮導入，包括簡化任務下達流程、建立清晰之指揮官作戰意圖、強化基層決策訓練、擴充基層ISR資源與整合火力授權彈性。須透過制度與教育文化的轉型，逐步培養信任與責任共擔的部隊文化，使任務式指揮不僅成為戰術原則，更成為部隊運作的日常邏輯，以達成快速應變、靈活運用與主動反制之防衛作戰目標。

守備旅於防衛作戰中 採用任務式指揮之探討

守備旅在防衛作戰中，將各兵種整合編組，結合情報監偵能力與戰術戰法，融入任務式指揮模式，理論上可有效因應現代戰場的多領域威脅與不對稱挑戰，強化基層部隊的戰術靈活性與執行力。然而，實際應用成效仍受限於裝備性能、訓練

35 孫銘鴻，〈機步旅跨區增援作戰效能之研究〉《步兵季刊》，第263期，2017年2月，頁6～10。



水準及指揮文化等因素，影響基層主官思維發揮與上下階層協同默契的建立。以下將從「基層部隊思維與所需能力」及「上下階層互信與協同」兩層面進行探討。

一、基層部隊思維及所需能力

基層部隊的思維模式與行動能力，是實現任務式指揮戰術靈活性與作戰意圖落實的核心。任務式指揮要求基層幹部在不確定情勢下，依據指揮官意圖自主判斷並迅速行動。雖守備旅整合各兵種專業與情報支援，提供一定條件，但仍受限於訓練模式、裝備性能及協同經驗，導致基層應變能力不足。以下從三個面向分析其待強化之處：

(一)基層指揮官的戰場態勢感知能力培養

基層指揮官須具備將零散資訊轉化為行動依據的能力，³⁶現行訓練多依賴程序化作業，缺乏針對混亂戰場下推理與判斷的培養，在情報不全或變化劇烈時，基層常難及時做出正確應對。建議導入不確定性推理訓練情報整合與戰場洞察，以強化實戰判斷能力，提升基層官兵臨場判斷與主動應對的能力。

(二)協同下的戰術判斷訓練模式

任務式指揮強調跨兵種協同與靈活調度，但基層訓練多偏向單一兵種操作，協同演練不足，導致面對多元威脅時，難以整合火力、機動與防禦能量。³⁷因此，應建立模擬作戰場景，強化基層幹部於非對稱環境中的整體判斷能力與指揮調配經驗，並訓練協同作戰下的統合運用與快速決策能力。

(三)裝備限制對基層應變能力的影響分析

守備旅在火力、偵察與機動支援上，仍存在射程短、數量不足、抗干擾差與調動遲緩等問題。基層面對敵多點登陸與機動攻擊，因資源有限，限制了基層官兵自主行動的選項與空間，難以即時調整部署或發動反制，削弱了任務式指揮所需的快速反應與分散行動效能。³⁸

二、培養上下階層互信默契

任務式指揮強調「意圖導向、分散決策」，其核心在於上下階層之間建立穩固互信，以確保在高壓、資訊不全的戰場中，基層能自主應變、上級能授權放手。守備旅結合多兵種特性與情報支援，具備發展任務式指揮的潛力，惟現行運作仍面臨文化與實務挑戰。³⁹

36 劉宗翰，〈論任務式指揮〉《砲兵季刊》，第192期，2022年3月，頁102～104。

37 李永悌，〈美陸軍強化駐地訓練〉《國防譯粹》，第48卷11期，2021年11月，頁7～11。

38 U.S.Army,《ATP 6-0.5 COMMAND POST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S》，2017，P.1-8、1-9。

39 U.S.Army, Army Doctrine Publication 6-22: Army Leadership and the Profession, 2019。

(一)互信機制於任務式指揮中的重要性

互信為任務式指揮的核心支柱，確保指揮意圖可順利向下傳遞，基層得以迅速回應。⁴⁰ 在灘岸防衛中，基層須仰賴上級提供情報與火力，上級須信任基層能適時決策與有效執行。若互信不足則易陷入微觀指揮與執行猶疑，嚴重削弱整體作戰節奏與戰術自主性。

(二)傳統指揮文化對互信的影響

國軍長期沿用集中化指揮與上對下的集中式指揮模式，導致基層習慣等待指令、缺乏主動判斷能力，與任務式指揮所要求的雙向互信出現落差。⁴¹ 傳統文化雖具備高度控制優勢，然在快速變化與高度威脅的戰場中，限制了基層部隊的創造性與適應性。

(三)強化指揮官與基層部隊之間互信的策略

強化上下階層間的互信，是任務式指揮落實的關鍵一環，⁴² 互信機制的建構亦可參照《軍制學》中對指揮體系責任的劃分加以補強，這樣的責任劃分顯示，任務式指揮中的互信，是奠基於制度性授權與雙向溝通的責任鏈結

。⁴³ 當指揮官下達明確任務企圖，並適度授權基層行動自由，基層則應具備企圖理解力與行動回饋能力，才能在快速變化的戰場中展現靈活應變，作為須透過訓練與文化改革，使雙方職責明確化與制度化，建立起可持續運作的互信機制。

三、分析與運用

守備部隊在防衛作戰任務執行上，面臨敵軍多點登陸、機動突襲與電子干擾等多樣威脅，現行體系尚難全面因應。雖然部隊編組已納入多兵種戰力，具備基本火力與監偵能力，但基層幹部在戰場態勢判斷、情報推理與自主決策等方面，仍顯訓練不足，導致應變反應易受限制。

由於多兵種協同訓練多半集中於演習測驗期間，平時訓練均在駐地實施，使基層指揮官在統合運用戰力上缺乏經驗。此外，裝備層面亦存在限制，包含火力射程不足、監偵能量受限與機動資源缺乏，使得基層無法有效因應快速變化的敵情，也限制了分散部署與靈活應對的能力。

指揮文化方面，傳統自上而下的指揮風格仍占主流，基層傾向依賴具體命令

40 同註9，頁91～93。

41 同註36，頁122。

42 同註36，頁121～134。

43 蔣緯國，《軍制基本原理》（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7年8月），頁103、104。



而非主動判斷，進而抑制基層幹部發揮主動性與戰術創意，上級也因信任落差，容易介入過深，影響整體指揮彈性與戰場節奏。

導入任務式指揮，能為上述困境提供可行的解方。該模式重視意圖導向與分權執行，強調上級清楚交付任務目的與原則，讓基層在受限條件下自主採取行動以完成任務。為提升此指揮模式之成效，應強化基層幹部在不確定環境中的推理判斷訓練，建構以實戰情境為本的模擬演練機制，並增加兵種協同作戰課目與資源整合機制。

此外，信任是任務式指揮成功的根基，必須透過制度化訓練、雙向檢討與經驗分享機制，形塑上下階層間的理解與默契。當基層能充分理解上級意圖並獲得信賴支持，方能發揮自主行動的潛能，提升防衛作戰整體效能，建立具彈性與持久性的國土防衛力量。

結語

任務式指揮雖源自普魯士軍制，但歷經美軍實踐與制度化後，已發展為現代軍隊核心指揮架構之一。其重點不僅在於授權下放，更強調上下層間的互信與共同理解。對守備旅而言，採行任務式指揮有助基層快速反應與靈活部署，特別在多點威脅並存的環境中，能有效提升任務遂行的自主性與效率。

任務式指揮理念於國軍防衛作戰體系的應用可行性，並以守備旅任務與編組架構作為探討對象。任務式指揮主張明確傳達指揮官意圖、強化分權決策與基層主動性，具備高度戰場適應性，能有效因應現代戰爭「高變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渾沌性」等特徵。守備旅任務偏向區域防衛與快速應變，其作戰特性與任務式指揮理念高度契合。

推動任務式指揮於守備旅之落實，仍面臨裝備、文化與訓練三方面的挑戰。現階段部隊裝備在火力、監偵與通資方面仍具侷限，使基層在缺乏即時資訊支援下難以獨立決策。指揮文化上，長期依賴集中命令的習慣，使上級不易放權，基層亦缺乏自主行動的信心與經驗。同時，訓練模式多著重技術操作與標準流程，未能強化基層官兵的意圖判讀、戰場推理與風險承擔能力。若要落實任務式指揮精神，應同步推動制度鬆綁、裝備優化與訓練改革，逐步建立具有信任、彈性與判斷力的國土防衛體系，以因應未來複合戰場環境之挑戰。

(114年4月24日收件，114年7月3日接受)